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选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军事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00,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50

书号: 11071·484

定价: 1.65元

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	沈 勃 (1)
巨画《江山如此多娇》的装裱过程	张贵桐 (65)
谈谈我从艺的道路	梅兰芳遗稿 (69)
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	梅兰芳遗稿 (73)
梅兰芳游俄记	梅兰芳遗稿 (93)
谒梅兰芳墓感赋	许姬传 (133)
记著名老旦演员李多奎	延 昌 (148)
北京市封闭妓院的片断回忆	陈心濂 (160)
附：张翠喜在斗争妓院领家老板会上的发言	(178)
“粮老虎”落网记	彭 城 (182)
人民的怒吼	刘尚煜 (192)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书画义卖	邱震生 (199)
中央公园记	朱启铃遗稿 (202)
正阳门城垣改建史话	朱海北 (205)
五十二年的北京师范学校	刘士杰 (209)

在台湾阿里山的见闻 孙金铭 (253)

大华百货公司的经营管理 赵宜之 (262)

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

沈 勃

党中央敲响了“定锤音”

一九五六年，我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威信，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很想直接听到中央和市里领导同志的报告。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就酝酿着在北京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以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到了一九五八年，各方面要求把首都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的呼声更加高涨。于是，这年的七月，市委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这个团的团长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当时我也是这个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与此同时，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同志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试搞一座万人礼堂的设计，只是没有规定建设地点和建筑面积。设计院根据郑天翔同志的这个指示，搞了一次全院性征集设计方案的活动。到八月八日，共收到十个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都考虑到了要盖礼堂及一部分会议室、休息室；面积在三万到五万平方米之间。设计院技委会把这些方案张贴出去，进一步征求大家意见。

我们赴苏考察团回国后，立即投入了这一工作。当时设计院的同志在设计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万人礼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二是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去参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下旬，当冯佩之和我向郑天翔同志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时，天翔同志告诉我们，已从北戴河传来消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时间已十分紧迫，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万人礼堂的地点选在天安门前，并希望能同改建天安门广场一起考虑设计方案。我们感到，党中央已为我们吹响了前进的号角，投入这场战斗的时刻来到了。

十大国庆工程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在玉渊潭附近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宾馆。万里同志还传达了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高，艺术要好的指示。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

有我。会议认为：由于时间十分紧迫，除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要立即准备外，设计工作乃是关键，故决定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尽早提出设计方案。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把这些建筑搞得更好，还决定由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发出电报，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要加紧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组织施工队伍，力争十月份破土动工。

九月六日，冯佩之局长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工程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设计规划。

九月七日，我和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同志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在经万里同志同意后，向十六个省市发出了电报。

九月八日，万里同志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一千多人做了动员报告。大意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五千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要求这些国庆工程要少而精，既实用，又美观；既保证质量，又讲求艺术，且要具有民族风格。建在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并与天安门建筑风格相协调。建筑施工中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最后要求大家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方案来。万里同志报告后，我同与会各单位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向他们分发了各项国庆工程的规划位置图及有关设

计的简要资料；北京各设计单位立即向本单位职工工作了传达动员，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当时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三十四个。

建筑专家云集北京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对这次邀请极为重视，故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九月十日晚间就已到齐。如江苏省副省长于九日晚亲自约请杨廷宝（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江一麟（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谈话，并代为买好第二天早晨的飞机票，送他们飞往北京。这次原只邀请二十多位专家，而实到三十多人。他们之中有上海的赵琛、陈植、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毛粹尧，吉林的郑炳文，浙江的陈曾植，河北的徐中、邬天柱，陕西的洪青，甘肃的杨耀，北京的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这些专家的住处被安排在和平宾馆。不少专家因来前未及细谈，连来京做什么工作都不大了解。鉴于这种情况，冯佩之和我于当天晚上，到宾馆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并要求大家在五天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还请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为他们搬来了画板和画图架。专家们听了传达以后，十分兴奋。有些专家当晚就行动起来，开始了方案设计。到九月十五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我们把方案拿到市委，请刘仁、郑天翔、万里等同志审查。市委领导没提具体意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做好方案。

外地有些老专家，还打电报给本省市要来年轻助手帮助设计

第二稿方案。到九月二十日，我们将大家设计出的一百多张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的五楼进行展出（方案包括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同时组织各位专家前往参观座谈，提出修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大家进行第三稿方案的设计。除北京各设计单位进一步设计方案外，还把在和平宾馆的各位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牵头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杨廷宝牵头作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赵琛（华东工业设计院副院长）、陈植（上海市设计院院长）牵头作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新老结合绘新图

专家们虽然在解放前后做过不少工程设计工作，但从未设计过如此规模宏伟和高质量的建筑物，所以三稿所提出的方案仍属老一套者居多；加之老专家们不好意思互提意见，所以设计方案进展不大。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加快设计进度，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刘仁、万里同志约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和文化部长钱俊瑞到市委审查三稿图纸、模型。大家看后认为，这些设计方案思想尚不够解放，需更广泛的发动群众进行创作。同时由冯佩之、沈勃、金瓯卜、李正冠、刘小石五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国庆工程设计工作。

因为方案定不下来，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所以各方面的领导对此都很着急。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我们发动群众的范围可以再广一些，可让青年人也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刘仁同志根据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当晚即到清华大学，要求校党委在帮助

老专家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同时，要组织青年建筑专家参加设计方案，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计意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于当晚发动青年同志积极参加方案的设计工作。

青年人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业务虽不熟练，但干劲十足，思想解放，老框框少。经过和老专家共同讨论，评比以前所做的种种方案，大家各展所长，互相学习促进，只三天时间就完成了第四稿方案，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当然对某些关键问题争论也很激烈，其中争论较多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①大会堂的地基是在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

②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

③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是三百五十米、四百米，还是五百米；

④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

⑤纪念碑左右是摆这两个建筑物还是摆四个。

天安门广场规划

北京的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一四〇七年），是皇宫的正南门。门前有一个丁字形广场，东西两翼各有一座“三座门”。正南还有一座门，叫大明门（后改称中华门）。这四座门之间有红墙相连，围成一个封闭的广场，总面积十一公顷。明清两代，广场两侧是封建衙门的集中地。如清代，东边有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西边有刑部、都察院、大理院等衙门。每逢皇帝登基等大典，都要在天安门上“颁诏”；打了胜仗，皇帝在这里接受献俘，以及举行“秋审”等大典。

辛亥革命以后，东西“三座门”才允许人民通行。后来的五四运动、三·一八运动以及以后多次学生爱国运动，都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过群众大会，举行过游行示威。昔日体现皇权皇威的地方已成为人民群众用做民主革命的广场。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典礼。纪念碑坐落在广场的中轴线上，距天安门城楼和正阳门城楼各为四百四十米。同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高高地升起了鲜艳的五星国旗。

一九五二年，应广大人民的要求，政府拆除了东西“三座门”及一部分红墙，并在天安门前修建了固定的观礼台。一九五八年五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时，拆除了两侧红墙及中华门。从此，形成了一个南起正阳门，北至天安门，东起公安街，西至西皮市街的大广场。

新中国建立后，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要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活动，检阅军队和游行队伍，晚上还要举行焰火晚会，因此，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作。一九五四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初步规划，在两侧各安排了三个大的公共建筑，建筑物的距离为三百七十米。以后又继续做了各种探讨，前后共做了九个方案。到一九五六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九个方案的基础上编制了第十方案。这时，正值中央提出十大国庆工程。规划局最初提出的规划方案，就是在以上方案的基础上制订的。当时的安排是，在广场的西侧建大会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安排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两个建筑。在大会堂的西边，沿长安街安排国家剧

院。

四稿以后，北京市委对建筑师们提出的新问题十分重视。彭真同志首先听取了修铮（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和我的汇报；然后，召集市委书记开会讨论，作出了如下几点决定：

（一）大会堂的位置选在广场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

（二）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

（三）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距离定为五百米；

（四）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物；

（五）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最后请周总理审定。

根据市委指示，我们又发动大家做出了第五稿。在讨论第五稿的过程中，又提出三个问题：

（一）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着纪念碑的中心？

（二）宴会厅的位置在大会堂南边还是北边？

（三）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

我们把这些问题的请示了市委。市委答复我们：大会堂正门中心不要正对纪念碑；其余问题可发动建筑师们进一步研究。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我们又组织设计第六稿方案。

一九五八年国庆前夕

临近一九五八年国庆节的时候，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宾、侨胞陆续到达北京。为了做好他们的接待工作，我们不得不把住在和平宾馆里的来京专家搬到西绒线胡同旅馆办公。大家在比较窄小的房间里，继续研究创制着设计方案。

当时的其它国庆工程项目已走在前边，进展比较顺利。如：民族文化宫已在兴建中；由军委负责的军事博物馆、由农业部负责的农业展览馆、由科委负责的科技馆、由美协负责的美术馆、由外交部负责的迎宾馆等，由于使用内容和建筑要求比较具体，争论较少，故设计方案相继完成。但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直到这一年的国庆前夕，所做的方案仍不能令人满意。这时候，施工部门和材料部门都在催促出图。因为这些工程都必须在次年八月底交工，才能赶上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使用。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了，大家怎会不心急如焚！

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受周总理委托负责联系国庆工程的建设事宜。这时，万里同志向他反映了情况，说明大会堂等建筑的设计方案如不能及早确定，将会影响交付使用，希望他向总理汇报；第六稿方案国庆节后即可做好，希望周总理看后给予指示。当天，齐燕铭同志答复我们：周总理答应十月五日或六日审阅方案。

建筑专家们听说周总理要看方案，十分兴奋。纷纷行动起来，连夜加班做第六稿方案。

九月三十日傍晚，我到西绒线胡同旅馆看望了各位专家。看到好多人的眼睛都熬红了，有的还带病坚持着工作。我劝说大家休息一下之后，请大家在第二天（国庆节）到天安门观礼台去观礼。这天的晚饭每桌特地增加两个菜、一瓶酒，以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并把原定十月三日夜十二点前交出六稿方案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四日晚十二点，大家才在国庆前夕吃了一顿舒心饭。

周总理初审方案

经与齐燕铭同志联系，我们在十月六日上午，把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的第六稿方案送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同日下午五时，我随同万里同志到了周总理办公室，首先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和齐燕铭同志。这时送去的方案已经在总理办公室旁边的餐厅里挂好。邓颖超同志先向我们说明周总理在六点半钟还要接见外宾，要我们抓紧时间。大约五点钟，周总理来到餐厅，听我们扼要介绍后，仔细地看了第一个方案。万里同志向周总理汇报市委关于建筑的布局等问题的意见后，又把在整个建筑形式及大会堂内部采用什么方案等问题上市委拿不准主意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请总理作出决定。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又重新看了一遍各个方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指着北京建筑设计院巫敬桓、林开武的方案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又指着张镈做的大屋顶方案说：“这个可以做美术馆的建筑形式。”接着又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些，做成一实一虚。”

关于万人大会堂内部的形式，设计方案中已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椭圆形等几何形状。周总理审视了一会儿说：“大会堂要看的好，听的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的马蹄形。又补充说：“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

这时，已经快到六点半了，邓颖超同志让齐燕铭同志催促周总理去接见外宾。周总理走后，邓颖超同志又对齐燕铭同志说：

“这些都是国家的重要建筑，要民主讨论，不要光听总理一个人

的意见”。后来，齐燕铭同志和万里同志商量，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进一步发挥建筑师们的创造性。

从中南海回来后，我们立即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发动大家做第七稿方案。九日，当第七稿方案做成后，我们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万里同志在征得总理同意后决定：选取七稿中较有特点的八个方案，制成照片，向全国二十七个省及部分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十月十日，我们以北京市的名义给二十七个省及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西安、兰州、重庆、杭州、沈阳、哈尔滨、包头等大城市发出了设计方案照片及征求意见的信。

塑菩萨故事的启示

彭真同志十分关心大会堂的建设，不断了解方案进展的情况。在作第七稿方案时，他正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视察各省大炼钢铁情况。十月十一日晚他从太原给北京市委打来电话，要我和一两名建筑师连夜赶到太原汇报国庆工程设计进展情况。十一日晚间，我和规划局的陈干同志、建筑设计院的程松茂同志连夜乘火车赶赴太原，第二天早上五点到达彭真同志下榻的太原迎泽宾馆。在我们扼要地向彭真同志汇报了设计方案进展情况和周总理审查方案的意见后，彭真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很着急吧，我和你们一样着急；但是工程一定要设计好。为了使你们开阔一下眼界，所以让你们出来看看各省市的建设，多吸收人家的长处，才能提出好的方案。例如，这个迎泽宾馆就有不少的长处值得你们学习。”

这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同志请彭真同志共进早餐。在早

餐桌上，彭真同志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以前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是男性，还长着胡子。五代时，有个叫戴逵的人，为了把菩萨塑好，他经常躲在塑好的菩萨背后，偷听群众的评论。然后他根据群众意见不断改进。这样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才把菩萨塑成现今这样美丽的样子。彭真同志接着指出：“你们要想把国庆工程设计好，就必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光是专家的意见，一般群众的意见也要认真研究，这样才能提出好的方案。”饭后，彭真同志又领着我们到楼的外面，给我们具体指点他认为迎泽宾馆设计得比较好的地方，并让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几天我们每天和北京通电话，传达彭真同志的指示，并了解北京关于方案设计的进展情况。

设计方案的确立

经过前七稿方案的探讨，共做出八十四个平面图，一百八十九个立面图。我们又请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组织少数有经验的建筑师，在发往全国的八个综合方案的基础上各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便最后提请周总理审定。到此，外地来京参加国庆工程设计的专家陆续离京。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厅通知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在当天夜间周总理由外地返京后，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冯佩之和赵冬日（规划局总工程师）当即将方案送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送上的方案共三份：一是清华大学作的，代表人刘小石（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一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的，主要设计人是张镈；一是北京市规划局作的，主要设计人是赵冬日、沈其（城区规划室主任）。

周总理在当夜约十时左右开始审阅。当时在场的主要人员有齐燕铭、万里、赵鹏飞、冯佩之、刘小石、赵冬日。

周总理首先详细看了三个方案的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由刘小石同志说明了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赵冬日同志介绍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设计方案和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

周总理反复比较了这三个方案，并多次提出询问。最后，周总理问万里同志：“北京市委的意见如何？”万里同志把北京市委及刘仁同志推荐北京市规划局方案（在做方案过程中，刘仁同志多次亲自参加规划局方案的研究）的意见作了汇报。周总理反复查看了规划局的设计方案，从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还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对照着看，并一再征求在场同志们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规划局的方案。

规划局的方案有两个立面图：一个台基高五米，一个台基高九米，周总理决定采用台基高五米的方案。此时已是下半夜一点钟左右了。

要体现“人民是主人”的设计思想

总理确定方案以后，十五日我在太原向彭真同志作了汇报。晚饭后，对建筑艺术问题彭真同志又同我、陈干及程松茂谈了很长时间。要求我们在大会堂方案确定下来后，对艺术风格要下功夫做好。他说：我谈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搞一个建筑设计，尤其是搞一个大会堂这样的公共建筑设计，在设计思想上，究竟是以表现建筑物本身为主呢，还是以表现使用它的广大人民为主呢？在封建时代，皇帝老子搞的建筑，体现的是“唯我独尊”；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搞的建筑则大部采用拜物教的建筑手法；